

# 方志敏狱中二三事

刘明钢



方志敏在狱中

方志敏烈士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狱中度过的。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直至英勇就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方志敏一面坚持对敌斗争，一面本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完成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不朽文献。

## “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

1934年1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囚禁于南昌“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入狱之初，方志敏被关押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敌人给他带了一副比普通囚犯要重10斤的铁镣。

方志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唯一不能释怀的就是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因此，入狱不久，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纸笔：“我写一个条子给军法处，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军法处满口答应，以为我是写什么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我在狱中写下这一本略述，当然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方志敏有了笔墨纸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6万余字。其间写作曾一度中断，“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但不久仍奋笔疾书，完成了这篇“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历史文献”。

## “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

在狱中，方志敏曾经动员狱友写作。他写道：“刘、王两人常下棋，我对棋是个门外汉，看也无心去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好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这件事情使方志敏清醒地认识到，找到“送信人”是问题的关键。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胡逸民。

胡逸民也是囚犯，但身份特殊。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逝世时，他是遗嘱的见证人和守灵者；他担任过国民革命军

事法官，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高等法院院长和南京、徐州、汉口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等职。1934年7月，因国民党官厅倾轧，胡逸民也成了犯人，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鉴于胡的特殊背景，狱方对胡监管宽松，生活优待，除了不能离开监狱，其他都很自由，连姨太太向影心也带在身边。胡逸民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虽是因徒，却当要训斥牢卒，连所长也得让我几分。”

胡逸民目睹了方志敏的入狱。他非常好奇，想了解“共产党三省苏维埃主席”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于是有事没事就去方志敏的囚室，接触多了，从心里敬佩方志敏。他甚至要求监狱“关押方志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锁，进出方便。我经常到他们的囚室去阅读，久而久之，彼此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了。”

为了争取胡逸民，方志敏与之谈了许多话。写了许多信。据胡逸民回忆：“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我也拿些给方志敏。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

胡逸民每次去找方志敏聊天，都看见方在写作，可是有一段时间，方志敏突然搁笔不写了，胡好生奇怪，问：怎么不写了？

方志敏叹了一口气，说：“写了也没用，又送不出去。”胡逸民答道：“那不见得。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替你办。”

## 李聚奎魏庄率师破敌

贾晓明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李聚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参与指挥了神头岭、响堂铺等战役。1938年5月，李聚奎随徐向前到冀南地区，任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政委。

抗战初期，鲁西北党组织与原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范筑先建立了合作抗战的亲密关系，中共鲁西特委通过六区政训处作为党的公开机构领导鲁西北抗战。11月，山东聊城失陷，范筑先殉国，鲁西北地区抗战形势恶化，日伪顽活动猖獗。鉴于此，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组成八路军一二九师抗日先遣纵队，在黄河以北、津浦路以西的鲁西北地区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由李聚奎任司令员兼政委。

李聚奎接到命令后，于12月在冠县崔八里庄迅速组建了先遣纵队机关。一二九师从冀南调来一个200多

人的营，又命令冀鲁边的津浦支队、冀南的青年纵队第三团及骑兵团划归李聚奎统一指挥。李聚奎又对鲁西北坚持抗战的部分部队进行吸收整训，壮大了先遣纵队的力量。

先遣纵队成立后，在李聚奎的率领下，协同八路军各部连打几个漂亮仗，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给鲁西北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持和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中共莘县县委重新建立。

1939年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筑先抗日游击纵队成立，归先遣纵队指挥。随后，李聚奎率领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紧紧依靠当地群众，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打开了鲁西北抗战新局面。

3月李聚奎奉上级指示，率先遣纵队到大行山整军，不久率部返回，进驻在莘县、冠县、聊城地带。李聚奎向各地派出工作队，帮助建立抗日

“如果先生愿意替我出力，那我将努力地写好它，写多少，算多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这些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我说到做到，请您放心。”胡逸民答道。

方志敏见他答应帮助将文稿送出，越发精力充沛地“重新来写”。

由于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杀害，方志敏没有长远的写作计划，只能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且争分夺秒地写。在一篇文章中，方志敏写道：“何时枪毙——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扶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之内，写好这篇文字。”写作消耗了方志敏“许多思想和心血”，以至不久，“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在短短的6个多月中，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完成了近14万字的重要文章。

## “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

自被捕之日起，方志敏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常是这样笑着说”，“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对于“国民党要人们来劝降，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放一大堆臭屁，但他不大答话，不与他们争辩”。对于同是底层的如看守和警卫，“则不放弃一点时机”，一有机会就孜孜不倦地向他们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方志敏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监狱文书高家骏被他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还答应写信给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托她帮助将文稿送出去。到了后来，敌人有所察觉，“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10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未能广大发展的原因，就是他们将我与许多人隔绝，不能接触”。

同时，他也展现出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

入狱之初，方志敏以为马上就会被处死，“在刑场就戮的份儿大概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吧”，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曾产生过越狱的想法。

一天，一个看守前来报告：“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案子被拖下来。”“怎么的，请说明！”

“处里呈了一封公文上去，说你们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毙；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两字。看来，你们的案子，一时解决不了。”

过了几天，看守又来报告：“你们的案子有希望了。”

这个消息让方志敏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想法。他写道：“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去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是的，应该决定！就是这样决定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他甚至憧憬着冲出牢笼，继续为党工作的情景：“这次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两年后，创造几十县的苏区，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不久，方志敏积极行动，就越狱征求狱友的意见。狱友认为，监狱“是敌人最巩固的后方，不容易冲出去”，“无外援是不能成功的”。

方志敏听取了狱友的意见后毫不悲观，反而从狱友的话中得到启发。他写道：“最苦的就是不知党的通信处，不能将狱中情形报告党。请党来援救，这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随后，方志敏千方百计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1935年6月，方志敏终于托人将《给党中央的信》交给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该信中，方志敏特别汇报了自己越狱的计划：

我想，若能越狱，必用尽力量，进行工作，在最短期内，恢复损失了的军队并创造大块苏区，以赎罪雪耻！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4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不幸的是，此时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中央红军正进行战略转移，无法为狱中的方志敏等同志提供帮助。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实践了自己“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豪迈誓言。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敌人伤亡惨重，见依靠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火力优势已经不能阻止八路军的攻势，遂向八路军释放毒瓦斯。第五营营长冯警涛不幸吸入毒瓦斯晕倒，被战士们用凉水救醒后，爬起来继续指挥战斗。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11时，残余日伪军丢弃大车，由汉奸带路，趁黑突围，向东王庄方向狼狈逃走。

孙庄桥是敌军越过马颊河向莘县逃窜的最近一个渡口。为防止敌人逃窜，李聚奎已经通知筑先纵队第三营营长赵健民率部在孙庄桥东设伏，消灭残敌。赵健民在桥东筑好工事，严阵以待，但未见敌人踪影。不久，侦查员来报，残敌害怕中途有埋伏，从远路绕道向北从河口逃窜了。赵健民得到消息，立即率领部队连夜追击，一直追到董王庄，将残敌追上，毙伤不少敌人。见县城敌人倾巢出动，开车赶来增援，赵健民遂命令部队胜利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40多人、伪军60多人，俘敌20多人，缴获大车8辆，步枪10余支，迫击炮1门等大批军用物资。

土革命时期，党组织在江西萍乡曾建立起三条红色地下交通线，肩负起沟通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传送党的文件、护送来往干部、运送物资和经费等重要任务。

1930年，党组织在萍乡地区开辟了连接湘赣、湘鄂赣苏区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从莲花县至萍乡安里，再经茅店、宣风珠亭山、石观泉至宜五区（即现天台、亭亭一带），途经的都是山区，隐蔽性强，很快就成了湘赣根据地与湘鄂赣根据地来往的主要通道。据老同志回忆，1930年秋，湘赣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缴获的无线电台和大批军用物资送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完成转运的。

1932年春，为了开辟湘赣、湘鄂赣苏区的第二条地下交通线，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成立宜（春）萍（乡）醴（陵）边区委员会，管辖醴陵北三四五区和东一区，萍乡北境的五五个区，宜春的逸市、金瑞等区，边委机关设在上市市斑竹山。在宜萍醴边委的努力下，很快就建立了由浏阳的大围山至醴陵白兔潭通往袁水流域的上市市、长坪里和萍乡县城、安源、宜春等地的地下交通线。1934年2月，湘赣、湘鄂赣苏区又开辟了从慈化经楠木、天台山、水江到萍乡长坪里，再往株萍至大安里的第三条地下交通线。

一天，一个看守前来报告：“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案子被拖下来。”“怎么的，请说明！”

“处里呈了一封公文上去，说你们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毙；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两字。看来，你们的案子，一时解决不了。”

过了几天，看守又来报告：“你们的案子有希望了。”

这个消息让方志敏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想法。他写道：“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去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是的，应该决定！就是这样决定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他甚至憧憬着冲出牢笼，继续为党工作的情景：“这次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两年后，创造几十县的苏区，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不久，方志敏积极行动，就越狱征求狱友的意见。狱友认为，监狱“是敌人最巩固的后方，不容易冲出去”，“无外援是不能成功的”。

方志敏听取了狱友的意见后毫不悲观，反而从狱友的话中得到启发。他写道：“最苦的就是不知党的通信处，不能将狱中情形报告党。请党来援救，这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随后，方志敏千方百计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1935年6月，方志敏终于托人将《给党中央的信》交给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该信中，方志敏特别汇报了自己越狱的计划：

我想，若能越狱，必用尽力量，进行工作，在最短期内，恢复损失了的军队并创造大块苏区，以赎罪雪耻！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4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不幸的是，此时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中央红军正进行战略转移，无法为狱中的方志敏等同志提供帮助。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实践了自己“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豪迈誓言。

1946年初，中共川南工委在贵州赤水县成立，廖林任书记。中共川南工委成立后，主动作为，因势利导，领导赤水及周边地区人民群众抗丁、抗税，与国民党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革命斗争。

当时，由于国民党赤水当局的横征暴敛，残酷掠夺，导致赤水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工商业倒闭，农村经济破产，大批群众失业，生活急剧恶化。但赤水国民党官员仍不顾人民死活，在青黄不接之际勾结地主、奸商，一面垄断粮食市场，囤积居奇，一面准备秘密将粮食运到其他地方出售，以牟取暴利，群众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中共川南工委立即行动起来，提出“反饥饿、求生存”口号，组织赤水群众开展阻粮粮食外运的斗争。

1947年6月，中共川南工委得到情报说，奸商准备偷偷将大米外运，现4艘装米的大船停靠在赤水县城北门码头。根据这一情况，工委立即组织群众前往阻拦。6月28日下午4时，穷苦民众3000多人在工委同志带领下齐聚北门码头，要求停止大米外运，遭到奸商拒绝，国民党军警闻讯赶来镇压。工委同志见状，果断带领群众快速上船，用衣襟兜米。大家很快将4船大米分光。当军警赶到时，民众已全部撤离。此

次“兜米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人民群众，给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地主奸商以有力打击。

1948年2月，中共川南工委获悉，国民党赤水县长亲自指使奸商将二郎滩、太平渡、大村、乐用、土城等地的大米低价强收后装船，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决定再次组织群众开展斗争。考虑到这次倒卖有国民党县长参与，敌人会出动重兵镇压，工委决定把党员和积极分子分成掩护、救援、兜米3个组，并制定了严密的计划。

3月1日下午，满载大米的七八艘大木船到达赤水县城，停靠在东门河坝。7时，各组人员按计划带领穷苦民众从四面八方赶到。掩护组的党员带领部分群众迅速登船，控制船上押运人员，把大米迅速运上岸。兜米组的同志指挥岸上群众兜的兜，扛的扛，很快将大米分光。

敌县长得到消息，企图驱散兜米群众，沿途遭到救援组同志带领群众的堵截。他们赶到现场时，兜米、掩护两组同志已经率民众带着大米撤离，斗争再次取得了胜利。

敌县长气急败坏，下令全城戒严，疯狂追捕领导兜米的“赤色分子”。此时，在工委的部署下，参加指挥“兜米”行动的同同志已安全转移到异地隐蔽。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IAN

## 萍乡的三条红色交通线

吴昌荣

土革命时期，党组织在江西萍乡曾建立起三条红色地下交通线，肩负起沟通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传送党的文件、护送来往干部、运送物资和经费等重要任务。

1930年，党组织在萍乡地区开辟了连接湘赣、湘鄂赣苏区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从莲花县至萍乡安里，再经茅店、宣风珠亭山、石观泉至宜五区（即现天台、亭亭一带），途经的都是山区，隐蔽性强，很快就成了湘赣根据地与湘鄂赣根据地来往的主要通道。据老同志回忆，1930年秋，湘赣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缴获的无线电台和大批军用物资送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完成转运的。

1932年春，为了开辟湘赣、湘鄂赣苏区的第二条地下交通线，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成立宜（春）萍（乡）醴（陵）边区委员会，管辖醴陵北三四五区和东一区，萍乡北境的五五个区，宜春的逸市、金瑞等区，边委机关设在上市市斑竹山。在宜萍醴边委的努力下，很快就建立了由浏阳的大围山至醴陵白兔潭通往袁水流域的上市市、长坪里和萍乡县城、安源、宜春等地的地下交通线。1934年2月，湘赣、湘鄂赣苏区又开辟了从慈化经楠木、天台山、水江到萍乡长坪里，再往株萍至大安里的第三条地下交通线。

一天，一个看守前来报告：“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案子被拖下来。”“怎么的，请说明！”

“处里呈了一封公文上去，说你们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毙；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两字。看来，你们的案子，一时解决不了。”

过了几天，看守又来报告：“你们的案子有希望了。”

这个消息让方志敏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想法。他写道：“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去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是的，应该决定！就是这样决定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他甚至憧憬着冲出牢笼，继续为党工作的情景：“这次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两年后，创造几十县的苏区，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不久，方志敏积极行动，就越狱征求狱友的意见。狱友认为，监狱“是敌人最巩固的后方，不容易冲出去”，“无外援是不能成功的”。

方志敏听取了狱友的意见后毫不悲观，反而从狱友的话中得到启发。他写道：“最苦的就是不知党的通信处，不能将狱中情形报告党。请党来援救，这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随后，方志敏千方百计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1935年6月，方志敏终于托人将《给党中央的信》交给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该信中，方志敏特别汇报了自己越狱的计划：

我想，若能越狱，必用尽力量，进行工作，在最短期内，恢复损失了的军队并创造大块苏区，以赎罪雪耻！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4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不幸的是，此时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中央红军正进行战略转移，无法为狱中的方志敏等同志提供帮助。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实践了自己“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豪迈誓言。

1946年初，中共川南工委在贵州赤水县成立，廖林任书记。中共川南工委成立后，主动作为，因势利导，领导赤水及周边地区人民群众抗丁、抗税，与国民党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革命斗争。

当时，由于国民党赤水当局的横征暴敛，残酷掠夺，导致赤水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工商业倒闭，农村经济破产，大批群众失业，生活急剧恶化。但赤水国民党官员仍不顾人民死活，在青黄不接之际勾结地主、奸商，一面垄断粮食市场，囤积居奇，一面准备秘密将粮食运到其他地方出售，以牟取暴利，群众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中共川南工委立即行动起来，提出“反饥饿、求生存”口号，组织赤水群众开展阻粮粮食外运的斗争。

1947年6月，中共川南工委得到情报说，奸商准备偷偷将大米外运，现4艘装米的大船停靠在赤水县城北门码头。根据这一情况，工委立即组织群众前往阻拦。6月28日下午4时，穷苦民众3000多人在工委同志带领下齐聚北门码头，要求停止大米外运，遭到奸商拒绝，国民党军警闻讯赶来镇压。工委同志见状，果断带领群众快速上船，用衣襟兜米。大家很快将4船大米分光。当军警赶到时，民众已全部撤离。此

次“兜米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人民群众，给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地主奸商以有力打击。

1948年2月，中共川南工委获悉，国民党赤水县长亲自指使奸商将二郎滩、太平渡、大村、乐用、土城等地的大米低价强收后装船，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决定再次组织群众开展斗争。考虑到这次倒卖有国民党县长参与，敌人会出动重兵镇压，工委决定把党员和积极分子分成掩护、救援、兜米3个组，并制定了严密的计划。

3月1日下午，满载大米的七八艘大木船到达赤水县城，停靠在东门河坝。7时，各组人员按计划带领穷苦民众从四面八方赶到。掩护组的党员带领部分群众迅速登船，控制船上押运人员，把大米迅速运上岸。兜米组的同志指挥岸上群众兜的兜，扛的扛，很快将大米分光。

敌县长得到消息，企图驱散兜米群众，沿途遭到救援组同志带领群众的堵截。他们赶到现场时，兜米、掩护两组同志已经率民众带着大米撤离，斗争再次取得了胜利。

敌县长气急败坏，下令全城戒严，疯狂追捕领导兜米的“赤色分子”。此时，在工委的部署下，参加指挥“兜米”行动的同同志已安全转移到异地隐蔽。

1943年3月，新四军五师部队进入湖北江陵，克复了大片地区，开辟发展襄南抗日根据地。5月，中共江陵县委、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同时建立起各级保安机构（在县委设立了社会部，县政府设置公安局，区和中心乡建立公安派出所），负责肃清奸细、维护治安、保护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等工作。9月，随着襄南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扩大，中共襄南中心县委、襄南政务委员会和襄南指挥部在江陵成立，江陵县委随即撤销，其原有的机构和下属5个区委直属中心县委领导。

1943年冬，国民党顽固派驻江陵军统特务头子朱耀东的爪牙简化轩、简学美叛变后，随简化轩逃进岑河口日据据点，不仅为日军提供情报，还公然为敌人外出劫掠当“向导”。县委将这一情况及及时向上级做了报告，提出派公安局手枪队进入岑河口，除掉“二简”，得到上级的批准。

当时，岑河口据点驻有100多日军和伪军曾尚武部一个大队。“二简”，自以为有日伪军保护，新四军不敢来，于是常大模大样走出据点，到镇上鬼混。一天，接侦察员报告，“二简”在镇上茶馆喝茶！手枪队立即乘6只木船出发，兵分两路进入岑河口锄奸，三区中队埋伏在镇外接应。

船靠岸后，手枪队长冷丹壕带部分战士从北面进镇，社会部副部长兼公安局秘书周方琳等从东面进镇，将茶馆包围起来。随后，冷丹壕走进茶馆，喊道：“哪位是简学美先生？外面有人找。”简学美听后，随冷丹壕走出茶馆，立即被手枪队队员活捉。接着，周方琳带人走进茶馆，来到简化轩身边，用枪口悄悄抵住简化轩的脑袋。简化轩回头一看，吓得连忙跪倒在地，连呼“高先生饶命”。

原来，周方琳奉上级命令，多次到江陵县保安司令曾尚武处做争取工作。在周方琳的教育开导下，曾尚武表示今后绝不与共产党为敌，并保证及时为新四军提供日军情报。为方便周方琳往来，曾尚武还“授予”周方琳上尉军衔，不仅陪同他“视察”了岑河口在内的伪军各驻地，还说服教育手下对新四军要“接受训导、一律照办”。简化轩曾在曾尚武处见过周方琳，因为当时周方琳化名高仰山，所以简化轩连呼“高先生饶命”。

周方琳亮出身份，喝令简化轩跟他出去。简化轩自知末日来临，于是拼命大叫，企图招来巡邏的伪军，但叫了半天连个伪军的影子也没有。周方琳当即亮出身份，向围观群众宣布简化轩的罪状，并下令将他就地处决。随后，手枪队押着叛徒简学美撤离。直到此时，曾尚武部伪军才赶来，一路朝天开枪，为手枪队送行。第二天，叛徒简学美经公审后被处决。

刘晓明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IAN

## “高先生”岑河口锄奸

刘晓明

1943年3月，新四军五师部队进入湖北江陵，克复了大片地区，开辟发展襄南抗日根据地。5月，中共江陵县委、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同时建立起各级保安机构（在县委设立了社会部，县政府设置公安局，区和中心乡建立公安派出所），负责肃清奸细、维护治安、保护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等工作。9月，随着襄南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扩大，中共襄南中心县委、襄南政务委员会和襄南指挥部在江陵成立，江陵县委随即撤销，其原有的机构和下属5个区委直属中心县委领导。

1943年冬，国民党顽固派驻江陵军统特务头子朱耀东的爪牙简化轩、简学美叛变后，随简化轩逃进岑河口日据据点，不仅为日军提供情报，还公然为敌人外出劫掠当“向导”。县委将这一情况及及时向上级做了报告，提出派公安局手枪队进入岑河口，除掉“二简”，得到上级的批准。

当时，岑河口据点驻有100多日军和伪军曾尚武部一个大队。“二简”，自以为有日伪军保护，新四军不敢来，于是常大模大样走出据点，到镇上鬼混。一天，接侦察员报告，“二简”在镇上茶馆喝茶！手枪队立即乘6只木船出发，兵分两路进入岑河口锄奸，三区中队埋伏在镇外接应。

船靠岸后，手枪队长冷丹壕带部分战士从北面进镇，社会部副部长兼公安局秘书周方琳等从东面进镇，将茶馆包围起来。随后，冷丹壕走进茶馆，喊道：“哪位是简学美先生？外面有人找。”简学美听后，随冷丹壕走出茶馆，立即被手枪队队员活捉。接着，周方琳带人走进茶馆，来到简化轩身边，用枪口悄悄抵住简化轩的脑袋。简化轩回头一看，吓得连忙跪倒在地，连呼“高先生饶命”。

原来，周方琳奉上级命令，多次到江陵县保安司令曾尚武处做争取工作。在周方琳的教育开导下，曾尚武表示今后绝不与共产党为敌，并保证及时为新四军提供日军情报。为方便周方琳往来，曾尚武还“授予”周方琳上尉军衔，不仅陪同他“视察”了岑河口在内的伪军各驻地，还说服教育手下对新四军要“接受训导、一律照办”。简化轩曾在曾尚武处见过周方琳，因为当时周方琳化名高仰山，所以简化轩连呼“高先生饶命”。

周方琳亮出身份，喝令简化轩跟他出去。简化轩自知末日来临，于是拼命大叫，企图招来巡邏的伪军，但叫了半天连个伪军的影子也没有。周方琳当即亮出身份，向围观群众宣布简化轩的罪状，并下令将他就地处决。随后，手枪队押着叛徒简学美撤离。直到此时，曾尚武部伪军才赶来，一路朝天开枪，为手枪队送行。第二天，叛徒简学美经公审后被处决。

刘晓明